

日本哲学史

朱謙之著

日本哲学史

朱 謙 之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四年・北京

日本哲学史

朱 謙 之 著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4 $\frac{1}{2}$ ·插页2·字数338,000

1964年8月第1版

196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2002·187 定价(六) 1.50元

印数0,001—2,100

目 录

第 一 章	神話传说及佛教化时代	1
第一节	古代神話传说	1
第二节	日本佛教	7
第 二 章	封建統治时期的朱子学之一	26
第一节	室鳩巢、貝原益軒	30
第二节	中井履軒、富永仲基	41
第 三 章	封建統治时期的朱子学之二	48
第一节	雨森芳洲、山崎闇斎	48
第二节	会澤正志、藤田东湖	54
第 四 章	儒学的分化之一：古学派	65
第一节	伊藤仁斎、伊藤东涯	65
第二节	荻生徂徠、太宰春台	73
第 五 章	儒学的分化之二：阳明学派	81
第一节	中江藤树、佐藤一斎	81
第二节	大盐中斎、吉田松阴	86
第 六 章	国学者的“日本精神”哲学	95
第一节	賀茂真淵	97
第二节	本居宣长	102
第三节	平田篤胤	109

第七章	封建制解体过程中新世界观的萌芽之一	115
第一节	安藤昌益	115
第二节	司馬江汉	136
第八章	封建制解体过程中新世界观的萌芽之二	146
第一节	三浦梅园	146
第二节	皆川淇园	152
第三节	山片蟠桃	157
第四节	鎌田柳泓	163
第九章	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	171
第一节	西周	171
第二节	福澤諭吉	186
第十章	明治时期的唯物主义与无神論	208
第一节	加藤弘之	208
第二节	中江兆民	224
第三节	植木枝盛	249
第十一章	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哲学	268
第一节	片山潜	268
第二节	幸德秋水	275
第三节	堺利彦	294
第十二章	日本型资产阶级哲学	304
第一节	西田几多郎	304
第二节	田边元	329
第十三章	战前日本型修正主义思想：三木清	340
第十四章	法西斯思想及其批评者	375
第一节	北一輝、大川周明	375
第二节	高坂正显、高山岩男	385

第三节	河合荣治郎	397
第十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的論爭和成长	406
第一节	山川均、福本和夫、河上肇	406
第二节	戸坂潤	420
第三节	永田广志	437
原始資料要目		451

第一章

神話傳說及佛教化時代

第一節 古代神話傳說

日本在第七世紀中叶大化革新以前，虽还没有以純粹的哲学形式出現的世界觀，但不能說沒有哲学。日本哲学思維在古代神話傳說中（如《古事記》、《日本書紀》所載者）即有萌芽，从它才过渡到真正的哲学史。

神話的产生是基于现实生活，所以高尔基曾說：“一般說来，神話乃是自然現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日本古代神話資料，虽記錄的时间較晚，如《古事記》在和銅五年(712)元明天皇治下編成，《日本書紀》在养老四年(720)元正天皇治下編成，但那些神話傳說，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古代的社会生活，其中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思想萌芽。由于日本民族从古即与朝鮮、中国有頻繁的接触，日本古代神話亦不断地吸收着新的内容。”但神話总是社会幼稚时期的产物，它不是真历史，因此对于依据“神代”卷而強調的所謂“神国”，所謂“万世一系”、“日神传统”的天皇制度，都必须重新估价。

（一）《古事記》 《古事記》是日本最初的国史，共三卷，記日本“神代”至推古天皇的神話傳說。上卷从天地开辟至神武天皇誕生，

其中包括天地初开的神話，国土生成的神話，天照大神的出現，天岩屋戶的故事，大国主命的国土献让，以及天孙降临等神話。中卷从神武天皇东征至应神天皇，亦带神話色彩。下卷記从仁德天皇至推古天皇的諸傳說。卷首有撰者安万侶上表，第一段云：

“夫混元既凝，气象未效，无名、无为，誰知其形？然乾、坤初分，参神作造化之首，阴、阳斯开，二灵为群品之祖。所以出入幽、显，日、月彰于洗目，浮沉海水，神祇呈于滌身。故太素杳冥，因本教而识孕土产島之时，元始綿邈，賴先圣而察生神立人之世。实知悬鏡吐珠，而百王相续，吃劍切蛇，以万神蕃息歟。”

这一段中的“混元”是指混沌元气，乾、坤是指天地，又无为、无名和阴、阳的概念，都应肯定是受中国唯物主义思潮的影响。至于参(三)神、二灵，出入幽、显，悬鏡、吐珠，吃劍、切蛇这些神話則反映着对自然的斗争，以及許多现实的矛盾事情(参看东方哲学史資料选集《日本哲学·古代之部》，商务印书館1962年版第7頁)。不过《古事記》的作者，认这些神話为实事，述其作书宗旨为：“斯乃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鴻基焉。故惟撰录帝紀，討覈旧辞，削伪定实，欲流后叶”。这就变成神道設教了。《古事記》所述自然界諸神与神化的祖先，到了后来，由于宗教家的附会，竟变成与佛教或儒家混合的神道。近代純神道复兴，将神道教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居然在1889年日本宪法第一条写着：“日本帝国将为从古以来万世一系之本朝諸皇帝所統治”！神統即皇統，皇統即神統，这么一来古代神話傳說竟冒充为日本民族的指导原理，这就成为大笑話、大騙局了。

《古事記》的开辟神話和皇統系譜，在《日本書紀》里有詳尽叙述。現在只略述其中最可代表日本古代人世界觀的神話。古代日本人十分看重生命，认为生命是从神而出。他們贊美生而迴避死，

可举《古事記》上卷第十八段伊邪那美命行往黄泉国的神話为例。文云：“最后，其妹伊邪那美命，亲自追来。伊邪那岐命乃取千引石，堵塞黄泉比良坂。二神隔石相对而立，致訣別之詞。其时伊邪那美命說：‘我亲爱的兄，因为你如此行为，我当每日扼你国人，一日扼死千人。’伊邪那岐命答道：‘我亲爱的妹，你如这样，我每日建立一千五百所产室！’是以一日必死千人，一日亦必生一千五百人。”（參看中譯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8頁）这是对于死而为生之凱歌，在生与死的斗争中，即使死之国的女神一日杀千人，而代表現国之男神宣誓一日产生一千五百人以为回答，可見生之胜利了。

（二）《日本书紀》《古事記》上卷全部为“神代”卷，《日本书紀》三十卷，則仅第一第二两卷为“神代”史。第三卷从神武天皇起至第三十卷持統天皇止，所述均以史事为主，可算正史体裁。但就前两卷看，其中关于世界創成的神話，国土生成的神話，和皇室譜系的神話，則因時間稍后，頗受中国哲学的影响。例如开卷天地开辟的神話：

“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渾沌如鸡子，溟滓而含芽。及其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淹滯而为地，精妙之合搏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然后神圣生其中焉。故曰开辟之初，洲垠浮漂，譬犹游魚之浮水上也。于时天地之中生一物，状如葦芽，便化为神，号国常立尊，次国狭槌尊，次丰斟亭尊，凡三神矣。”

这很明白是借用中国的古文献如《淮南子·天文訓》、徐整《三五历紀》、《礼記·月令正义》等书。案《淮南子·天文訓》：“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滯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又《三五历紀》：“天地渾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

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淮南子》是紀元前百十余年作，《三五历紀》出于三国时代，均为《日本书紀》的世界創成神話所本。

国土生成神話，是从伊弉諾尊、伊弉冉尊之从高天原下降开始的。《书紀》“神代”卷上有几种不同的記載：（一）“伊弉諾尊、伊弉冉尊立于天浮桥之上，共計曰：‘底下岂无国歟？’迺以天琼矛指下而探之，是获滄溟。其矛鋒滴瀝之潮，凝成一島，名曰磤馭卢島。”（《书紀》本文）（二）“天神謂伊弉諾尊、伊弉冉尊曰：‘有丰葦原千五百秋瑞穗之地，宜汝往而循之。’迺賜天琼戈。于是二神立于天浮桥，投戈于地，因画滄海而引举之，即戈鋒垂落之潮結而为島，名曰磤馭卢島”（《书紀》第一之“一书曰”）。案《古事記》，依天神的詔命，伊邪那岐命（男神）和伊邪那美命（女神）二神創生国土；《书紀》所載則只有上引的一处說是受天神的詔命，其余均說由二神自己发意。这是出于两种不同的傳說，在日本神話学上是个爭論的問題。二神創出一島之后，“于是阴阳始遘，合为夫妇。及至产时，先以淡路洲为胞，乃生大日本丰秋津洲；次生伊豫二名洲；次生筑紫洲；次生信歧洲与佐渡洲，世人或有双生者如此也；次生越洲；次生大洲；次生吉备子洲；由是始起八大洲国之号焉。即对馬、壹歧島及处处小島皆是潮沫凝成者也，亦曰水沫凝而成者也。”这就是日本国土創生的神話，也就是古称“丰葦原之瑞穗国”的由来。

关于四神出生的神話，这是在二神既生国土万物之后，共議生万代的灵魂。原文云：“既而伊弉諾尊、伊弉冉尊共議曰：吾已生大八洲国及山川草木，何不生天下之主者歟。于是共生日神，号大日靈貴。……次生月神，……次生蛭儿，……次生素戔鳴尊。”可是这素戔鳴尊“甚无道，不可以君临宇宙”，只好追放之于远方边裔之地。接着是素戔鳴尊在高天原与姊天照大神相会，結成瑞珠盟約

的神話，寶鏡開始的神話，寶劍出現的神話，乃至天孫降臨的神話，這就涉及神皇譜系的問題了。

關於神皇譜系的神話：首先是那作為神化的元祖的天照大神，號稱為“生命與光明的最高大神”，是日本的皇祖神兼太陽神的性格的，是女神不是男神。此神話的本質反映着古代母系氏族社會的女性主權者的形態。依《魏志·倭人傳》所寫邪馬台國的女王卑彌呼的一段，“其國本亦以男子為主，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眾，年已長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天照大神的生活史和历史人物的卑彌呼相似，可見此神話即反映當時女王存在的社會狀態。从天照大神到神武天皇，歷三代，年數共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七年。案《書紀·神武紀》皇統的譜系：是天祖彥火瓊瓊杵尊降自日向國高千穗之峰后，治天下三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二年，葬于日向之可愛山；彥彥火出見尊治天下六十三萬七千八百九十三年，葬于日向之高屋山；彥波瀲武鸕鷀葺不合尊治天下八十三萬六千四十二年，葬于日向之吾平山；神日本磐余彥尊即神武天皇，東征后，都大和國橿原，治天下七十六年，壽一百二十七歲，夭死。以上所謂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年的歷史當然只是神話，而皇統系譜的合數，更是一味推測之辭。日本史斷自神武，大成問題。據說神武天皇即位在公元前660年2月11日，當周惠王十七年，這只是捏造。史家考證，日本推古天皇十二年(604)時始定歷法，以一千二百六十年為一薨，以九年辛酉(601)為薨首，上推一千二百六十年(又一薨)定為神武即位之年，故適為公元前660年。

(三)《萬葉集》 《萬葉集》是日本文學中最著名的詩歌總集，

共二十一卷。編纂时代約在奈良末叶，全集歌数四千四百九十六首，作歌者男子五百六十一人，女子七十人，時間包括仁德天皇至光仁天皇(313—781)，作者包括自天皇、皇后至樵夫、漁夫所有階級。通过这一部古代詩歌总集，我們可以看出古代日本的神話、民俗等等，尤其是和《古事記》、《日本書紀》相关的神話，例如卷二《日并皇子奠殯宮之時柿木朝臣人麿作歌》或卷二十大伴家持《喻族歌》序言，很明白地是属于《記》、《紀》的神話体系的东西。而如柿木人麿，他从持統三年至和銅二年所作詩歌，有关于天皇贊歌的，如《幸于吉野宮之時作歌》，尊崇皇室，贊天皇即神。这种“現神”的思想，乃至认为自然、自然神、生物以及人类世界均在天皇的支配之下。又如《长皇子游猎路池之時作歌一首并短歌》，亦为好例。現在只举其有名的《过近江荒都時歌》，如云“再看那荒蕪的遺址，使我充滿了无言的悲哀”，这对于荒涼的皇宮遺址所起的无限的感慨，是与詩人的現神的信念有矛盾的。現神的背后，虽然有无数的神作背景，而結果仍不过是幻灭，所以詩人悲哀了。

和柿木人麿之为宮庭歌人相反，山上忆良是一生为貧穷所困的詩人。他歌咏人民生活方面，可取有名的《貧穷問答歌》为例。这是一篇耐人寻味的社会批判，同时也是对天道无知的控訴的长歌，其能打动讀者的心情，也許是出于空談神道的人之上万万吧。尤以其中《反歌》里有句云：“既非生有翅膀的鳥，不能飞去奈若何！”这是以现实否定为媒介，而趋向于现实的肯定。虽然忆良所作《好去好来之歌》，所抱国家观仍然是神化的傳說的肯定，但是以确定地上的权威来代替了天上的权威。于是“天皇即神”的神話时代过去了，继之便是“推佛于神，复援神于佛”的宗教时代开始。当然，宗教时代，还不能根本使神話消失，而只能使原始神話变成宗教的神話。

第二节 日本佛教

日本古代民族的神話傳說虽只是反映古代人們幼稚的世界认识并夹杂着盲目信仰的因素，好些地方却充滿着肯定现实生活的乐天气概。然而，到了人們漸漸自觉自己是人不是神，而感觉到自己的无力，这就导致把自己和神分开而拜倒于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宗教及其神的面前，于是神話时代便进到宗教时代了。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烟，是顛倒的现实之理論。正如毛澤东同志所云：“屈服于自然力之前而只能使用簡單工具的原始人类，不能說明周围的事变，因而求助于神灵，这就是宗教同唯心論的起源。”“基督教說上帝創造世界，佛教及中国一切拜物教把宇宙万物的运动发展归之于神力，所有这些离物质而思考运动的說法，都和辯证法唯物論根本不相容。”日本的宗教最重神道，神道是从神話的演变而来，其根据乃在《古事記》、《日本書紀》等古典之中，但在第十八世紀中叶“复古神道”未产生以前，原始的神道早已被佛教所代替。原始神道有人說是薩滿教的一种，也有人說：“盖所謂神道者，即为道教，日本固早重之”（黃遵宪：《日本國志》卷三十七）。而要之，佛教之初輸入日本，即和这原始神道互爭宗教的支配权。到了最澄、空海，唱說日本某神即某佛菩薩化身，于是日本之神无不是佛，神道也佛教化了。日本自称“神国”，但也是“佛国”，据《日本國志》（卷三十七）所載万延元年（1860）統計，佛寺共四十六万四千九百四十二所，中国佛教盛时尚不及其十分之一。佛教传入日本，据《日本書紀》：在欽明天皇十三年（552），百济王始獻佛像及經論，別上表說其流通的功德。但据表中所引《金光明最勝王經》語，知为偽作。佛教東渡年代，从来即有異說，可注意的是佛教渡來以後，即喚起日本統

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斗争——蘇我党与物部党的思想斗争。蘇我党为佛教派，物部党为神道派，前者获胜，佛教终于在用明天皇、推古天皇及圣德太子的保护之下，在日本繁荣起来了。

圣德太子即厩戸皇子，是給日本文化开新紀元的人，从他以后佛教和儒教才真正和日本文化接触而发展成为大和貴族之間爭取統治地位的武器。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来隋朝学习，直接輸入了佛教和儒家思想，这就准备了“大化革新”的思想条件。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太子发布十七条宪法，如第二条“篤敬三宝”項与第十条“絕忿弃嗔”項，均属佛教思想；其余各条多采五经、四书及子、史等資料，可見其受中国思想影响。尤其关于传佛教事，如所造大伽兰九，即近江一州，有四十八寺；推古十四年(606)讲《胜鬘经》，即其地建橘寺；又讲《法华》于岡基宮，作《胜鬘》、《法华》、《維摩》等三经疏；二十五年(617)出奏曰，“后代多灾患，非佛法力，难固帝祚。請立梵刹，以鎮护之”，乃創大安寺。圣德太子提倡佛教，是給皇室中心主义服务的。《維摩詰疏序》：“維摩詰者，乃是已登正觉之大圣也。論本既与真如冥一，談迹即示万品同量。”这里，本=真如(即本体)与迹=万品(即現象)的概念，和解脫的思想，虽还不够馬上就开始形成日本哲学的世界觀，却可算外来哲学思想在日本的展开。《法华经疏》发一大乘机，明真俗一貫之旨。《胜鬘经义疏》认为如来藏自性清淨心存于道俗一切，自觉人人有同等的权威和价值，因而自利利他。圣德太子四十年的扶持佛教，基本上是将佛教和中央集权的統一国家的存在相适应，使之为奴隶主貴族現世利益服务。佛教比較原始神道更能巩固中央集权，更能为广泛的剝削基础服务，因此就能在日本根深蒂固，成为統治階級长期不可少的东西了。

佛教到了最澄、空海，乃和固有神道融通，而形成日本的宗

教。日本佛教继圣德太子之后，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以平安初期最澄之天台宗、空海之真言宗为代表；第二期以平安后期至镰仓初期源信、源空（法然）之净土宗，荣西、道元之禅宗为代表；第三期以镰仓时期亲鸾的净土真宗、一遍的时宗、日莲的法华宗为代表。

第一时期 平安朝初期的佛教是对于奈良时代佛教的一个革新。奈良时佛教的主要派别是三论和法相，到了这时只剩得宗教的形式，尤其纲纪紊乱已极。桓武天皇敕语云：“今见众僧，多乖法旨，或私定檀越，出入閭巷，或诬称佛验，诬误愚民”；“又沙门不崇胜业，或事生产，周旋閭里，无异编户，众庶以之轻慢，圣教由其陵替，非只黷乱真諦，固亦违犯国典”。他一方面对于奈良旧寺院加以制裁，另一面即对于平安近畿山城诸寺加以提倡。敕语云：“真教有属，隆其业者人王；法相无边，闡其要者佛子。……是以披山水名区，草創禅院，尽土木妙制，庄飭伽蓝。”继桓武之后，嵯峨、淳和天皇均倡佛教，保护新宗。在《凌云集》、《经国集》、《文华秀丽集》有御制诗可见，皆倡山林佛教，以与奈良旧都的旧教团相对抗。奈良时佛寺多设立于皇都国府附近，俗称都市佛教；平安朝創立研学修道的丛林于山中僻静的地方，号称山岳佛教。山岳佛教仍保存奈良佛教所常见的镇护国家的宗教色彩，却加强了那为统治阶级祈求荣达和幸福的所谓祈祷宗教的性格。空海于弘仁七年（816）請开高野山建立禅院；最澄在弘仁九年（818）告諸弟子文中說：“当为国为家，山修山学，利益有情，兴隆佛法。”这一方面可說是对于奈良朝都市佛教的反应，一方面也反映当时唐代正在盛行的丛林风气。平安朝来唐学問僧，最喜欢巡拜天台山和五台山，认为巡礼了这些圣迹，便可以超凡入圣，这也是山岳佛教在日本发达之一誘因。

天台宗开祖最澄（神护景云元年——弘仁十三年，即767—

822), 本姓刘氏, 世居近江国滋賀之三津地方。十七岁出家, 偶于奈良得讀《天台四教仪》、《法华玄义》等写本。十九岁登比叡山, 建草舍, 讀《法华》、《金光明》等諸大乘经。延历二十三年(804)随遣唐使渡唐, 就道邃、行滿等修天台教义, 归国后传布台教, 得朝廷皈依。弘仁十三年(822)卒, 后諡传教大师。所著书存一百六十部, 重要者有《願文》、《守护国界章》、《山家学生式》、《显戒論》及注《法华经》、《金光明经》等。其弟子慈觉大师圓仁, 亦为平安朝来唐八家之一, 所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記》。

最澄在日本評價頗高, 三枝博音《最澄論》称之为“斗争的理論家”, 并指出其所移植的天台教学有显著的辯证法思想方面。实际上最澄思想的确是从和奈良佛教斗争中出来的, 他的二大著作《守护国界章》与《显戒論》, 都是对奈良佛教的理論斗争。最澄論战的对手是主法相宗的教学的德一。德一有《佛性鈔》, 最澄于弘仁八年(817)作《照权实鏡》, 破其三乘佛教而主一乘佛教。論战往复前后八年, 其間德一著《惠日羽足論》、《遮异見章》、《中边义鏡》等, 主张五性各别, 法华权教, 批判天台教义; 对此, 最澄作《一乘义集》、《法华去惑》、《守护章》等。德一更著《法华肝心》、《法华权門》等, 討論一乘三乘問題, 最澄則报之以《决权实論》、《法华秀句》并《依凭天台宗》等。最澄不但和德一从事理論斗争, 更和以奈良文化为中心的南都学僧从事实践的斗争。在他所作《山家学生式》文中, 树起了“利今利后, 历劫无穷”的新佛教的旗帜。

最澄为求天台宗的独立, 反对独立僧侶須在奈良諸寺的戒坛受戒, 主张在叡山設立戒坛受大乘戒, 然而朝廷对于他所作《山家学生式》, 认为必須经奈良的僧侶审核, 这些僧侶不消說都是反对最澄的。《本朝高僧传》本传, 弘仁“十年三月, 上表乞建大乘戒坛于叡山, 共条四科, 具证緣起。降表南京諸寺, 詳定建否。兴福寺

护命抗表斥之。东大寺景深著《迷方示正論》，举二十八失。南都七寺，毀唇喧廝。明年二月，澄著《显戒論》三卷表进，博引大乘戒文，作《显戒緣起》，返詰二十八失。又降其书，无敢問議者。”这一場論战，消极方面是反对法相宗之階級特权思想，即所謂“三乘真实、一乘方便”之三乘說，而主张“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之一乘說。三乘說承认人間实生活的差別性，引申起来即頑固地坚持人間的階級特权，这是公开为剝削階級的特权辯护。相反地，一乘說不认为三乘（声聞乘、辟支佛乘、菩薩乘）之分是决定的东西，开始注意于籠絡一般平民。最澄指斥法相宗，而主张“今废偏真之理，除如幻之知，破三乘之固执，而传真实之教，显中真之理”；即在戒律之中，也力主大乘教，反对固执階級的差別。在上四条《学生式》中云：“国宝国利，非菩薩誰？佛道称菩薩，俗道称君子。其戒广大，真俗一貫”；这是很明显地站在籠絡平民立場，对奈良佛教痛予打击。但論战不只有消极的意义，更有团结大众来守护国家的积极意义。如《守护国界章》开头即云：“五时三时，随机而雷霆；三車五車，比輪而运载。权实同韵，守护国界”；只要能守护国界，則权也好，实也好，出家也好，在家也好。最澄的护国主义，于《七难消灭护国頌》中，于《天台法华宗年分学生式》中，于《上〈显戒論〉表》中，均随在可見。日本的国家的自觉，是从最澄开始。依其所定教学計劃：“凡止觀业者，年年每日，长轉长讲《法华》、《金光》、《仁王》、《守护》諸大乘护国众经”；“凡遮那业者，岁岁每日，长念《遮那孔雀》、《不空》、《佛頂》諸真言等护国真言”；因此他的教义便具有鎮护国家的性格。“我斯日本国，……建立法华宗，……繕写《法华经》，永納七大寺。恒运唯一事，同会五种姓，俱駕大白牛，皆悉到宝所。每季光明会，将鎮于国家。”（《后文略願文》）佛教护国主义固然有“国家的自觉”的一面，但其本质还是貴族統治者的思想，是为貴